

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

张鸿石

摘要 一国的外交风格多表现为该国外交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味,有时也表现为某种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一国之外交风格深受该国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并与其外交性质、目的等有内在统一性,它在推进该国外交利益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对中国外交而言,外交风格对提升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关键词 外交风格 国家 中国外交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凸显,中国迫切需要加强自己的外交价值与外交风格塑造,为此非常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外交风格给予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国家的外交风格问题,美国学者康威·汉得森(Conway W. Henderson)曾谈到国外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不承认有所谓“外交风格”,甚至认为相关讨论属无稽之谈。^①但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原因是从各国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国际关系的观察者经常体察到各国外交的细微差异,而且仔细品味后可发现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是由浮现于外交表面的诸如外交政策、手段、目标等不同所促成,也并非仅由涉及思想层面的外交哲学、理念的差别所引起。在这些方面由于各国存在历史、文化、宗教甚至地理上的诸多区别,当然会使其外交表现得风情百种,仪态万千;甚至这些差异也不是由外交传统使然,因为这些像油画的基底那样常被外在的笔触所掩盖,因而并不能仅靠一般的感觉所觉察。那么,在上述之外依然能被我们凭直觉体察到的那些差异究竟为何物?笔者认为这就是外交风格。此外,如换一个角度继续追问,那些常被人称颂的所谓外交家

* 张鸿石 燕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秦皇岛 066004)。

** 本文刊发前曾得到《外交评论》杂志审稿专家极具学术见地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深表感谢。

① 美国学者康威·汉得森在其所著的《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中也谈到有许多学者持同样观点,他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他随后对“外交风格”所作的相关论述并不深入,因此笔者试图对此作进一步探讨。参见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203—205页。

的个人“魅力”其又意在何指？笔者认为它依然主要是针对其外交风格而言的。

一、何谓国家的“外交风格”

康威·汉得森将国家的“外交风格”定义为“国家和其他行为角色制定与执行其对外政策的独特方式”。^①但这样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似乎不足以使人充分领略外交风格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和其对外交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理解外交风格首先要从理解“风格”入手。在汉语中，风格指风度、品格，亦有风韵、特色之意，其与“风仪”、“风雅”“风致”等词语意颇为接近；在英语中“style”一词基本可与汉语的“风格”通译，其亦有作风、文风、式样、符合时式乃至时髦的意思。一般而言，风格向人们展示的更多的是某种特质、格调、品味，或是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处世方式，并因其涉及社会的、个人的及其心理的诸多因素而表现得极为复杂。风格中常有自我标榜的意味，也有故意矫饰的成分，稳定且具有连续性是其通常的特征，“与众不同”是风格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依此类推，一国之外交风格大致可以认为是在外交行为中，表现出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味，有时亦指那些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它们是该国外交思想中透露出的某些相对含蓄但却并非隐晦的精神性追求与外交行为中展示出的目标追求以外的那些东西的一个颇为复杂的混合体。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将外交风格界定为“政治家、外交家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气度与作风，它常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政治家、外交家的个人思想、教养、品德和作风的现象表现”。^②可见，外交风格远比汉得森所强调的“独特方式”复杂得多。从外部特征上看，外交风格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并经常从一国外交政策倾向、外交官言谈举止及其外交行为方式中表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似乎仅可意会，而无法言传，所以对其只作描述性的界定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理解它。

外交风格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与各国具体的外交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与它们构成一种如影随形的密切关系。一国的外交风格可细分为外交政策风格、外交决策风格、外交行为风格、外交思想风格、外交谈判风格乃至外交家个人风格等等，不过其最终还是通过一国外交家的具体外交活动表现出来。在上述这些具体外交风格中，外交政策风格因具有外在性特征，最易被感知。如美国外交政策就素来以个性张扬而著称，有人将其概括为“对外交政策中过于笼统的道德思想及宏大的全球思想有一种偏好”，^③这种风格特征其实也经常被我们明显地感知到。对外交政策风

① 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第203—205页。

②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47页。

③（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仁、王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格,人们常用强硬、温和,或者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甚至是简单粗暴、含蓄优雅一类字眼概括。至于外交家的个人外交风格,因其本来就是一个被刻意彰显的东西,所以更容易被人观察到。从中国古代的苏秦、张仪,到欧洲近代的梅特涅、拿破仑、俾斯麦、塔列朗、格莱斯顿,再到现代的基辛格、葛罗米柯等人,他们无不以外交风格鲜明而著称。而外交谈判风格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各国之间还有显著不同。《外交谈判导论》一书的作者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作者在论述美国与东亚国家如日本的外交谈判风格时指出: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都源自儒家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社会结构,故这些国家的谈判者“往往秉持另一套价值观和准则:顺从、信任、缄默、等级、责任、忠诚与和谐”;而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美国的谈判者是以其对计划的放任态度、西部牛仔式的枪战技巧、对快速行动的要求以及过于拘泥于法律而著称。”^①

与前三者相比,存在于外交决策、外交行为、外交思想方面的风格确实有些隐晦,但却同样不可否认地存在着。通晓决策理论的人都知道,理性决策的前提是获取“完全信息”,但真实的决策环境要么是信息太少很难满足需要,要么是太多从而出现“过滤信息”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样“预期效应”就会对决策者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最终的结局是如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所指出的——“决策者追求的不是最大化而是满意”。^②这样,决策者对“满意”的主观性追求往往以特定的“选择偏好”表现出来。结果,外交决策者所表现出的特定“选择偏好”就构成某种外交决策风格。外交行为是对外交决策的具体执行,根据“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理论,决策行为者常表现出一种把过去的决定、先例、惯例、政府角色当成参照物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倾向。这种惯性化的行为倾向,久而久之也铸就出一些特定的外交行为风格。对此人们一般常用稳健、冷静、务实,或冒险、冲动等来评价。当然,在外交行为风格方面,有时确实会出现在国家外交风格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同一国的外交家的外交行为风格却有所不同甚至迥异的现象。例如同为德国外交家,俾斯麦的外交行为风格稳健、冷静、务实,而威廉二世则正好相反。那么是否能因此得出各国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连贯和基本一致的外交行为风格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德国外交,我们就可发现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曲折之后,到了联邦德国时期,其外交家身上又重现了俾斯麦所代表的德国外交行为风格。因此,威廉二世的个人外交行为风格只能算是德国外交风格中的个例,这与他乖张的个性和对德国外交缺乏深刻理解不无关系。至于外交思想风格,它是对外交思想的倾向性、思维方式及思想传统等的凝聚和反映。如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就为英国外交思想赋予鲜明的个性风格,^③德国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强烈影响到其外交的

① (美)布里吉特·斯塔奇等《外交谈判导论》,陈志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② (美)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

③ 陈乐民先生对英国思想传统与其外交风格的关系有精彩论述。参见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思想风格。如此看来,讨论外交风格决不是什么无稽之谈,相反由于其在外交中深具影响的存在,遂使这种讨论在并非只崇尚规范性研究的外交学领域,变得既有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

二、影响国家外交风格形成的因素

汉得森曾谈到外交风格与“国家风格”的密切关联,但却并未对外交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其实,与其说一国的外交风格与其“国家风格”有紧密关联,不如说它与该国地理环境、历史经验、文化、哲学观、国民性乃至社会风俗的关系更密切,因为“国家风格”究其本源也无非是由上述因素所促成。法国外交家朱尔·康邦(Jules Cambon)曾指出:“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也是它为什么必须有一项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①康邦的这一结论虽未明确指出地理因素与外交风格形成的连带关系,但用在本问题上似乎也同样具有说服力。当然,对地理环境在外交风格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应有恰当评价,否则极易陷入地理决定论的误区。其实,地理环境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一国的外交风格,它是通过人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去实现这种影响的。面对同样地理环境人们在理解上会有很大出入,但无论怎样理解,该方面的影响总归是存在的,这正如国际政治学者斯普劳特夫妇曾指出,“在形成某种情绪、偏好、决定和行动方面,对环境的错误观念同正确的观念一样具有影响作用”。^②以英、德两国为例,我们就会明显地发现,在它们外交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地理因素确实发挥过巨大影响。历史上,英国曾利用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四次击退欧陆强国进攻,第一次是西班牙,第二次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第三、四次则分别是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这些欧陆强国在与英国交战时,国力都如日中天,但每次都被并不宽阔的英吉利海峡所阻扼。上述历史经历一方面强化了英国对“岛国环境”价值的认识,从而增强了面对强大对手时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使它总是怀着警惕和防范的心理注视着纷扰不断的欧陆国家,并极力避免身陷其中。这对日后英国形成自信、超然的外交风格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德国在地理上处于欧洲腹心,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和依托,故而在战事频仍的近代欧洲,极易在他国攻击中陷于被动。这一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战略文化,进而又影响到其外交政策和外交风格。结果,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近代德国更热衷于国家间的权力角逐,这同近代英国注重“势力均衡”的战略观以及法国从自然权力中派生出的“天然疆域”观念有很大不同;表现在外交风格上,就是近代德国外交追

^① Jules Camb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ower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5, pp. 23—24.

^②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An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8. 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求绝对控制权和支配权,习惯于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运作,并倾向于将展示实力作为提升外交影响力的手段。

在一国外交风格形成中,来自历史经验和哲学传统方面的影响同样巨大。乔治·凯南曾谈到美国外交具有“墨守法规—道德”的风格特征,他认为这与美国早期的历史有关。美国的建国经验表明,通过接受一种共同的行政和司法体制,可以把原来13州在利益和愿望上的冲突减少到无害的程度,并使它们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和睦相处的关系。这一历史经验给美国留下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岁月中美国不断地进行着“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回顾”,凯南认为正是这种历史回顾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①其实,我国学者王逸舟也曾谈到历史经验、民族信仰体系等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家和军队将领不大可能像普京那样‘秀肌肉’、赞美军队的国际进逼行动。恰恰相反,中国即便在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也多半是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中国人看重国家间的理解和相互尊重,也比较有耐心;而美国人重实利,说话办事风格非常直白。”^②

而哲学传统对一国外交风格的影响,则稍显复杂。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哲学传统都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化的观念体系和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因而它们本身即具有某种风格特征,因此当它们影响一国外交时,必然会将其固有风格特征赋予该国外交。如果这种逻辑推演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以实例加以验证:在一些外交风格明显的国家,英国一向以奉行保守主义哲学传统著称,这种哲学传统的风格特征正如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在其《保守主义的含义》一书导言注释中谈到的那样,是“非系统化、经验主义、厌恶理论、讲究实际并且日复一日毫不间断”,^③此种风格特征其实在英国外交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其表现形式是英国外交常能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时调整政策,而不以抽象的理论、原则裁剪时势。对此,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张伯伦曾有过清晰的诠释:“你可以提出所有这些普遍原则,但是,这都不是政策。如果你要制定一项政策,你就必须审视具体情况……很明显,外交事务中的情景和条件每日每时都在变化。如若你的政策要适用于这些不同的情景,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④这段话非常生动地揭示出保守主义哲学观与英国外交风格之间若隐若现的联系。

与上述因素相比,也许文化对一国外交风格的影响更大。汤因比在谈到“风格”的形成时曾说“杂乱感是风格感的一种消极的替代品,而风格感的发展和文明的生长是同一步骤”,^⑤这实在是文化(文明)与“风格”形成两者关系的恰当评论。不

① 参见(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蔡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79—84页。

②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8页。

③ (英)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④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⑤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会影响各国的外交谈判风格,首先是因为归根结底作为谈判代表的外交家们无法脱离对其个人成长发挥着至关重要影响作用的本国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不仅塑造了其言谈举止等方面的个人风格,而且还为其提供了一套成熟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而这些最终将通过外交家个人行为在国家间的外交谈判中体现出来。其次,文化环境还会在制度层面上为各国提供相对稳定的模式安排并进而影响到它们的制度操作,而这些自然会在各国具体的外交谈判风格中体现出来。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前面曾提到过的美日等国在谈判风格上所表现出的显著不同,就变得不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了。最后,关于国民性与社会风俗对各国外交风格的影响,相关的例证其实更多。以英、法两国为例,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需要经常生活在脱离陆地政权管辖的临时团体中,因而在其国民性中多体现出水手—海盗—商人—海军等多重角色性格与气质,久而久之培养出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以及建立在利益与尊严一致基础上的服从精神,这种国民性格对英国外交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之相比,在早期的法兰西民族身上则更多地表现出生活于陆地的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们勤劳勇敢,安分守己,安土重迁,所以其早期所开拓的那些殖民地,后来都往往因缺乏本土移民在数量上的优势而无法固守。而且,在跟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几次战争中,法国尽管也有一些天才的外交人物,可是在外交上总体显得墨守成规,缺乏战略的明智和战术上的主动,故总是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三、国家外交风格的本质化特征

理解外交风格与一国外交哲学、外交传统和国际通行外交惯例的相互关系,能加深我们对外交风格本质化特征的认识。首先,一国外交风格与其外交哲学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外交哲学是指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思想体系或价值观念,它是一国外交的观念形态。而外交风格则基本属于外交的实践范畴,它没有外交哲学那样的理性色彩,更不具备外交哲学那样的宏大意义,但却不能因此贬损风格的价值,其实正是因为它不具外交哲学的理性色彩,才使外交家能够以更直观、更生动的风格形式对本国外交之愿望、利益和价值进行“自由”表达。他们利用风格的直观性打破了外交哲学的艰涩,而将国家的利益需求变成一种明快的形式,将一国外交的哲理性思考化作清晰可见的形象,并且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呈现给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外交风格亦可看做是该国外交哲学的外在表达。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外交风格时,就从分析其政治哲学观入手,并认为这与他的“法理—道德主义”的或“现实主

义”的政治哲学观有关。^① 因此,如果我们能充分地理解外交风格的这一特性,外交风格就不再是一种哑剧式的表演而成为我们可读懂的语言。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国家正是以此来影响外交目标国对特定问题的看法、观感、态度和体验的。如果它真的奏效的话,那么,该国的外交就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并能由此获得某种哲学层次上的象征意义。

其次,一国的外交风格不同于该国的外交传统,虽然在外交传统中也许能更清晰地观察到该国外交风格的存在。一国的外交传统主要是指那些由历史沿袭而来的外交习惯做法、外交制度、外交思想等,外交传统可潜移默化地对一国外交实践发挥某种规制作用。马克斯·韦伯曾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论及“传统”,他认为“传统”是将习惯连续化的行为,并认为当传统取向的行为变成自觉行为时,它倾向于成为某种特定价值的表达。^② 显然,在这里韦伯强调了传统的连续性和规制性特征。其实,传统还具有保守性特征,其经常代表一种要求保持既有状态甚至是要回到以往中去的力量,故对外交来说它多少带有因循的味道。与外交传统不同,其一,如前所述,外交风格主要是通过外交家的具体外交活动体现出来,它并不直接来自过去,更不刻意强调回归过去,它与过去的联系充其量不过是偶尔对“过去”的“模仿”,因之就使它少了许多因循的意味;其二,虽然外交风格与外交传统一样都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存在着,但外交传统多集中表现在一国的外交习惯、制度、思想中,而外交风格则散见于外交家们“现时”的外交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它是一国外交家实践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现实反映;其三,与外交传统不同,外交风格更多融入了外交家个人的人文因素,这就使外交风格与外交传统相比多了几分“空灵”的成分,而外交家们的外交活动一经脱离了这种“现时”的空灵状态,就不会再有自己的外交风格了。

最后,一国的外交风格与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之间,似乎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总处在一种相互抵触的状态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与讲求墨守成规的外交惯例、外交规则不同,外交家展现出的外交风格经常有鲜明的个性,而这些丰富多彩的风格会为原本刻板、生硬的外交惯例、规则加入些许人文气息,由此使整个外交活动变得生动、丰富。另一方面,任何外交惯例和规则其实也都为外交家充分展示其风格留下了足够空间,所以在外交家的精准把握下,外交风格通常并不会对通行的外交规则和惯例造成削弱或破坏;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弥补外交惯例、规则中某些因时势变迁而产生的“瑕疵”。不仅如此,某些与风格相联的外交做法日久天长,本身就可能固化为外交惯例或规则,这在现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并不少见。总之,存在于外交惯例和规则之外的外交风格对外交而言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果说外交风格是外交哲学的外在表现的话,其对外交惯例和规则来说则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当然,无论是外交风格的塑造还是展现,都离不开外交家个人的因素,因此外交

^① 参见石斌《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5—106页。

^② 参见(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11页。

风格的本质化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人文特性。对外交风格的这种认识关涉对外交的整体性理解,从19世纪法国学者加登最早给出的有关外交定义,到现代英美等国出版的权威辞书中,都将外交界定为“谈判的艺术”,这种对外交的理解尽管正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①但其所强调的外交具有人文特征这一点却不应予以怀疑,外交风格的存在及其所表现出的种种特性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四、国家外交风格的功能性作用

对外交来说,外交风格的价值并不在于简单的点缀,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是对人们广为熟悉的外交行为方式的一种浓缩,外交风格能将隐藏在外交背后的复杂意蕴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形象并传递给对方,因此在一国外交实践中发挥许多“功能”性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外交风格可为一国外交提供方向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精神的真理恰如其他种类的真理一样,往往先须通过外表可见的象征,凭类比的方法才能予以领悟。”^②外交风格之于外交的重要性,恰在于其能为该国外交提供如上所称的那种“外表可见的象征”,它能将该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价值取向连同其精神性诉求乃至相对次要的意旨情趣,一并包罗进那些可被称为外交风格的东西中去。这些外交风格的存在与延续,能为各国外交提供一种避免外交事务所特有的杂乱感的统一性,使其外交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操作层面均具有某种一致性,而不致在诡秘多变的国际外交舞台上失去方向感。

(二) 外交风格可为一国的外交手段、方式、目标等提供华丽的装饰。这正像一件衣服上的精美饰品,没有固然未尝不可,可有了肯定不是一件坏事。由外交风格提供的这些装饰可有效地避免外交活动流于粗鄙化,并使其向着原本应有的精致化方向发展。此外,在推动一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和扩展一国外交利益的过程中,这些发挥着装饰作用的“风格”还能起到类似润滑剂的作用,可有效降低和缓解来自外交目标国最初的消极反应。

(三) 外交风格有利于外交的职业传承。每个国家外交风格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内含的基本价值早已超越了外交官的个体生命和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所以,不是风格本身而是其内在气质会在一国的职业外交官身上代代延续,在给该国外交带来连续性、稳定感的同时,也给新操此业的年轻外交官以职业精神、行为规范和内在气质等方面的稳定传承。摩根索曾强调,“成熟的政治制度则要

^① 德里安就不赞成“外交是谈判的艺术”的观点,在他给出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界定中,将外交称作是“以国家组织起来的、在一种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不和的民族的思索”。参见 James Der Derian, *On Diplomacy*,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42。

^②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第269页。

用传统和规章来保证外交质量的连续性”^①显然,一国的外交风格也可发挥类似摩根索所说的传统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风格的存在,那种能够保持外交质量连续性的外交传统也因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些无疑都会促进该国外交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

(四) 外交风格可构成一国外交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曾说“美国的形象和对他人的吸引力是许多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综合体。它部分依赖于文化,部分依赖于国内政策和价值,部分依赖于外交政策实质、策略和风格。”^②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论及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时也曾强调“200年来,美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它使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③其实不只是美国,英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近代以来英国外交一直在世界上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在鼎盛的英帝国时代,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其国力强盛所致,但到了现当代,当其国力早已今非昔比时,其外交依然像许多学者谈到的那样拥有全球影响,这恐怕要归功于包括外交风格在内的外交技巧、谋略、经验等“软实力”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了。

(五) 外交风格可以增强民众对本国外交行为的认同。一国的外交风格是该国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生活态度等的高度浓缩,它带有明显的国家印记和民族特性,以这种风格展现出的外交活动极易为本国公众理解、接受和认同,从而避免一项外交政策将会遇到的国内阻力,显然这对提升该国外交的行动能力大有助益。此外,由于外交风格本身体现了该国社会风尚和精神追求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因此它还会为该国外交政策或行为提供某种恰当性说明,鉴于同样的原因,有时它又可为该国某一不为外交对象国接受的外交方式或行为提供辩白的理由和遁词。

(六) 一国的外交风格还可丰富该国外交文化。在近代欧洲,外交从业人员大多出身于贵族阶层,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熟悉精致生活的所有细节。在外交场合,他们举止优雅得体、衣着考究、用词华丽,有着一种大致接近的风格。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附庸风雅,而是外交行为所特有的品质。在当代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正如汤普森指出的那样,“美国国务卿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做过律师。许多要职,包括国防部里的国际安全事务次长和助理部长,一直被认为是律师的天下,他们执行外交任务时竟能一个案子又一个案子地进行,就像他们在国内法律系统中一样。”^④所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这些有着共同知识背景和文化取向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彼此间都恪守相近的行为方式,保持相似的处事风格,并且都自觉地将他

①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第5版修订版) 杨歧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6页。

② (美)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③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④ (美) 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47页。

们各自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赋予特定的价值,这对“外交文化”^①的形成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几乎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那些外交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或国家,其外交文化的构成中除外交思想、外交观念和外交经验外,外交风格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

当然,除上述积极意义外,外交风格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如下两点:一是在早期外交中常见的那种过分讲求风格化的倾向,它使外交场合充满了过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与奢华场景,结果形式冲淡了内容,不仅降低了外交效率,还容易使外交流于表面化;二是过分讲求风格的风气在职业外交家中盛行,有可能使外交界变成一个孤芳自赏对外封闭的小圈子。《外交谈判导论》一书的作者曾以戏谑的口吻谈到,“外交是一个充满惯例和象征的古老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极为重视头衔、等级和礼节的职业兄弟会。”^②尽管与前述那些积极方面相比,外交风格的这些负面影响是次要的,但它确实曾给早期外交造成过伤害。

最后应予指出的是,外交风格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渐趋发挥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当代中国的外交风格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李宝俊曾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更加“灵活务实”;^③王逸舟则认为,“在外交风格上,中国这30年的外交一直信守邓小平所要求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在国际事务中奉行不对抗、不结盟、不扛旗的立场,在综合国力和外部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始终保持低调、冷静、平和的处事态度”;^④而孙哲认为,“中国外交风格的形成,显示了中国在对外工作上日益走向成熟”。^⑤此外,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涌现出大量研究中国领导人个人外交风格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在努力构建大国外交格局的过程中,今后仍有必要在继承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现有外交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凝练自己的外交风格,这对中国进一步提升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等无疑将大有帮助。可以确信,一种具有融入现代外交理念并包含着“和谐”价值的中国外交风格,将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责任编辑:李丹)

① 有关“外交文化”的概念和相关论述,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② (美)布里吉特·斯塔奇等《外交谈判导论》,第59页。

③ 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

④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第7页。

⑤ 孙哲《结构性导航: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第62页。